

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

——紀念貝克逝世一周年

● 周桂田、徐健銘

摘要：本文概述德國社會學家貝克 (Ulrich Beck)《風險社會》相關重要觀點的發展。「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提出風險分配的邏輯與財富分配的邏輯間的異同，與自馬克思和韋伯以降的重大觀點交互相映，並指出當代社會的情況。同時也從德國的發展經驗中提出當代社會基本體制下所形成的個人化過程：每個人都必須直面其自身所不能完全掌握的個人生命經驗，並且學習如何對自身負責。而作為個人於社會中生存的參照系統，也就是名為科學的事物，卻在當代複雜並彼此交構且跨界的風險中逐漸瓦解其權威性，並迫使其面對科學知識所未及之處，甚至是未知的不確定性。這些問題所促成的反思與反省，迫使整個社會必須改變其自身的定位、範疇和秩序；這個過程便是從「第一現代」邁向「第二現代」的過渡，也就是「反身性現代化」的過程。當前社會的全新風險是跨界且不分階級地降臨，使得研究者必須從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轉向世界主義。而對行動者而言，貝克認為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

關鍵詞：貝克 (Ulrich Beck) 風險社會 世界風險社會 反身性現代化 世界主義

我們活在一個逐漸難以理解的世界中。它不僅正在改變 (changing)：它乃是正處於鉅變之蛻變中 (metamorphosing)。改變意謂着某些事物變遷的同時，還有其他事物維持不變；資本主義改變了，但資本主義的某些面向卻依然如故。鉅變意謂着更加劇烈的變革，現代社會過往的確定性正在消逝，同時有些相當嶄新的事物正在浮現。要掌握這世界的鉅變，有必要在當前的亂局中探索新的起點、聚焦於從舊事物中所浮現的，以及尋求掌握未來的結構和規範^①。

一 前言

在原定於2015年出版的新書《世界的蛻變》(*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中，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用毛毛蟲來比喻當代人：毛毛蟲雖然在其繭中經歷劇烈的變化而蛻變為美麗的蝴蝶，卻對其所經歷的一無所知。當代社會的人們也是如此，雖然不斷地經歷環境與氣候變遷風險、科技變遷和各種國家與國際體制的轉變，但卻幾乎沒有感受到任何特別的時刻、特殊的事物之臨近；而且可能對這些轉變毫無意識，也不了解其構成與生成的原因。

關於貝克，最有名的著作當屬1986年的《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一書^②，該書被翻譯成三十五種語言在全球發售，無論是在學術上或是實際政治運作與運動中，其「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除了長期擔任德國重要社會學期刊《社會世界》(*Soziale Welt*)主編直至退休之外，貝克並於慕尼黑大學創設反身性現代化研究中心，持續拓展他自1996年以來轉向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議題的理論與實踐關注，並倡議社會科學界應揚棄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轉向跨界的方法論上的世界主義(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③。2010年前後貝克開始將研究焦點集中在當前的全球性議題(如氣候變遷、災難治理)，並於2013年起爭取到歐盟政府支持「世界主義—氣候變遷」(Cosmo-Climate Change)跨國大型研究計劃，與日本、台灣、南韓、澳洲、歐盟和南美學者進行合作，然而這個計劃由於他在2015年1月驟然離世，目前分別改為個別的跨國合作研究。

貝克早期任教於德國巴伐利亞邦北部的邦堡大學，於1988年成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聘教授，隨後並擔任所長。1990年代中起同時受聘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教授，並曾於2010年前後到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人。2007年他曾短期受邀至北京大學訪問，並於2008與2014年到南韓首爾大學參加反身性現代化研討會與世界主義治理研討



2014年於首爾會議之合影。左起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林子倫教授、首爾大學環境學院尹順真教授、貝克教授、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周桂田主任、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張國暉教授。(圖片由徐健銘提供)

會。貝克原定於2015年中訪問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與台灣學者就「風險社會」理論的研究與實踐展開對話，可惜因他的遽然離世而無法成行。

從政治實踐上看，貝克除了長期進行對德國與歐盟政治的批判分析之外，也曾經擔任巴伐利亞邦與薩克森邦未來問題委員會的成員。特別是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貝克出任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 召集的德國能源安全供應倫理委員會委員，定調人類能源發展與運用不能僅限於科學層面，而應審視倫理與社會永續意義。該委員會最終做出德國將於2022年終止核能發電的決議^④，衝擊全球各國核能政策，包括對日本、台灣廢核政策產生影響。

上述這些學術與社會實踐，充分彰顯貝克主張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是行動取向的制度建構研究，亦即：風險即是決策，改變決策，就能改變風險。如法國知名學者拉圖 (Bruno Latour) 眼中的貝克，就是一個法國式的德國公共知識份子——致力於研究不斷改變產生社會和世界方式的行動者。拉圖認為他扭轉了人們對社會與環境間關係的看法，並承繼了韋伯的思想，而貝克生前正在深入研究的問題乃是「全球風險的轉變力如何改變世界？」^⑤

2015年，國際社會學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的通訊《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簡介了貝克的研究對世界的影響。首先，貝克的作品在北美的學術社群裏有着深淺不一的影響力。最具影響力的部分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語學術社群之中，這是基於與歐陸學術研究群體之間的合作關係與共同研究旨趣。魁北克最重要的社會學期刊之一《社會學與社會》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曾在2012年以貝克的觀點為參照刊行關於「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特輯^⑥。雖然過去貝克的作品與美國學術界的交集較少，但實際上近年來在環境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以及災難社會學的相關討論中也無法避開貝克的觀點；而他對於世界主義的看法，也與美國社會學對於跨國和全球等各種主題探討之重要觀點有一定相近性^⑦。在今日討論災難、全球化風險與環境議題時，貝克的作品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

另一方面，貝克在拉丁美洲和東亞的影響明顯較強。從1970年代開始，拉美學者就已經開始反思國家從獨立之後走向新殖民 (neocolonial) 的情境、思考其經濟發展對社會的剝削，進而發展出「依賴理論」 (dependent theory)。這些思維可以說在其發想的基礎上與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有關全球化、科學與技術知識和社會與環境間的關係，有着相當接近的思想基礎。尤其在發展中國家，風險可能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代價；握有權力定義「風險」者，也往往是全球風險不平等中的受益者，這也形成重要的問題^⑧。

「風險社會」的觀點於1990年代初期就被引入東亞。在台灣，顧忠華及鄭文輝首先探討「風險社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⑨；1990年代末以來，隨着一批早年留德年輕社會學者陸續返台，顧忠華編輯了《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一書，介紹貝克「第二現代」 (Second Modernity) 理論的各式觀點^⑩。同一時期，周桂田發表大量中文著述，探討「風險社會」的理論概念^⑪，並深化其理論與「科學、技術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研究的對話，延展至風險治理之制度與決策研究^⑫。貝克著述的中譯本亦相繼問

世，如孫治本於1999年譯出《全球化危機》(*Was ist Globalisierung?*)；由蘇峰山等人翻譯貝克與妻子合著的《愛情的正常性混亂》(*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於2000年出版；至於第一本《風險社會》中譯本也在汪浩的努力下於2004年問世^⑬。此後，許多新一代學者不但持續深化「風險社會」的在地實踐，並就東亞社會不同的新興科技與環境風險議題，批判性地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觀點。

事實上，「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中國大陸不能說相當新，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文獻予以引用，並且大量出現貝克相關著作的翻譯。與台灣同時，中國大陸也在2004年出版《風險社會》中譯本，另外還有《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世界主義的觀點》(*Der kosmopolitische Blick oder*)、《世界主義的歐洲》(*Das kosmopolitische Europa*)等^⑭。直至貝克於2007年訪問北京大學，高度惡化的環境問題、社會安全體制的挑戰更是人們討論和關心的重點。而時至今日，中國經濟的「硬著陸」、霾害空氣污染的嚴重性，都遠遠超越貝克當年的「風險社會」推論的規模。甚至我們可以說，中國各式各樣且相當龐大的風險尺度與問題，是過去西方社會科學界前所未有的探討標的；而中國的環境污染與社會問題之擴延，也面對貝克的世界主義觀點中治理與責任的挑戰。

在日本，貝克的理論與觀念被應用在環境社會學的面向，而且在2000年以後，他關於個人化的理論架構也受到日本學界認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他關於風險的理論建構更加備受重視。事實上，貝克不僅致力於探究風險的本質，也鼓勵民眾參與公共決策，並避免決策權受到企業和專家所壟斷。在南韓，貝克先後兩度訪問首爾大學並進行學術交流，其「風險社會」概念受到以首爾大學為首的學者大量引用，並且轉譯「風險社會」概念來反省南韓社會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⑮。

作為一個依據現實調整其理論和研究旨趣的社會學家，貝克在他生命最後幾年的作品中延伸了過去的研究主題。然而隨着他的逝世，我們僅能再一次簡單爬梳他過往的作品與研究旨趣，接續他對社會的關懷和研究的進程。本文試圖藉由關注貝克在「風險社會」理論中提出的幾個重要觀點，包括世界風險社會、世界主義研究觀與災難的解放性等，以及他的理論在全球的迴響，描繪這位當代社會學大師對我們這個時代所帶來的啟發，以紀念這位始終在關懷當代社會如何可能轉變的研究者。

二 《風險社會》的基本觀察

以「風險社會」作為主題，貝克的深刻洞見來自他長期對現代性的發展過程中的基本機制有極細緻的觀察。在這些基本機制中，一方面，他觀察到全球化、個人化的過程，以及一個特殊的現象，即從財富分配的邏輯到風險分配的邏輯，乃至於社會不平等的極化。另一方面，他也從科學與現代性的糾葛過程中，批判本來是除魅者的科學竟成為另外一種宗教。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認，除了科學，當前並沒有更好的工具來分析、解剖和理解當代社會。

今天所有的討論都必須在「科學」的框架下進行，一旦被視為「不科學」，其基本價值就可能被忽視。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開展以來，現代性的各種基本原則，如普世價值、科學、理性仍然是今天的重要議題，然而其發展之初的那些機制、機構和規範卻在不斷的變革中倒下，然後又再重新建立。

在貝克眼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不斷崩壞又同時在重建的現代世界裏。所謂的「現代」並沒有變成「後現代」，而是在不斷地試圖重塑其自身來適應這數百年光陰中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各種變革。現代性的精神仍然是當代人試圖捕捉的：可控制性、確定性和秩序。然而，現代性誕生時的機制、組織、團體和各種結構卻必須在現代性的精神中不斷調整其自身，以避免被完全的不可知所摧毀，或是毀於絕望的自我停滯中。傳統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是由可控制性、確定性和秩序所構築的「第一現代」(First Modernity)，而「第二現代」則是指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自相矛盾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所身處的現代社會總是在一個過渡期中，在知與無知(non-knowledge)之間不斷掙扎、正面接受不確定性的變革浪潮拍打着我們當代人的思維。這正是「風險社會」的特徵，也就是第二現代本質中永恆的變革性。

《風險社會》於1992年譯為英文^⑥，由拉什(Scott Lash)和維尼(Brian Wynne)兩位知名學者作序。在本書中，貝克將其研究思路拔高到十九世紀思想家的位置，從討論馬克思與韋伯等人的理路來觀察當代社會的問題，並思索未來的可能性。儘管本書的經驗事實大多源自德國，但其思想脈絡與提問則延續馬克思、韋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齊美爾(Georg Simmel)等人的研究。這本書所導出的是從工業社會蛻變為風險社會的過渡情況；儘管貝克本人也在書中承認某些內容出自經驗導向和主觀的理論^⑦，但該書仍然對今天的研究者在研究方向、構想與觀察當代社會時有所啟發。

從工業社會蛻變為風險社會的過渡情況，貝克在《風險社會》中稱之為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⑧。在許多研究者爭論這是一個新的時期還是一個過渡(「後現代」或者「晚期現代」)的過程中，貝克坦承其研究所要追溯的正是那被冠以「後」(“post”，或者可以“late”或“trans”作為前綴)的事物——但這並非「後現代」，而是藉由其風險研究來改革和修正現代主義者的計劃。如前所述，啟蒙時期的思想或許還縈繞在我們的時代精神中，但是我們身處的環境卻早已變遷。貝克的實事求是，體現在他所提出的「反身性現代化」乃是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以解決當前社會中各種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

貝克指出：「現代化消融十九世紀的封建社會結構並產生工業社會，今日的現代化正在瓦解工業社會，而另一個現代性則正在成形中。」^⑨也就是說，十九世紀的現代化力圖主宰作為他者的自然，當前的現代化則是自挖牆角、對於自身的不斷質問；十九世紀被除魅的是階級與宗教，今日則同樣發生在科學、技術和典型工業社會中的生活方式。貝克認為，這並非現代性的終結，而是關於生活形態和基本條件的轉變，使得嶄新的風險已經誕生；而這並不是源自外在於人類社會的自然或者神意，乃是人為的。因此，前者是典型的(classical)現代化，後者則是反身性的(reflexive)現代化^⑩。

《風險社會》一書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處理風險分配的邏輯，並且描繪何為「風險社會」。第二部分處理的是當代社會基本體制下的個人化過程。前兩部分都是討論關於反身性現代化過程的問題，而第三部分則是基於反身性現代化的探討，進一步向內對風險的來源和定義者——科學——進行反思。這三部分的研究成為貝克後續研究中的基調，不斷擴充和發展，而貫串於「反身性現代化」的理論之中。

(一) 風險分配的邏輯

《風險社會》一書的第一部分討論了風險分配的邏輯。貝克從毒物在生活環境中的流布開始探討風險。他指出風險分配跟追求「平均值」解答之間，出現置現實於不顧的情況：如集中在某一場址的重金屬污染物，平均分攤在一個行政地區所有人的身上，濃度就顯得正常。平均值忽略了因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方式、資訊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所導致的風險機率分配亦不同；另一方面，借助平均值所推估出的風險閾值（跨過此門檻即被視為危險），雖然看似設下安全標準，但對人體健康是否可能造成影響卻尚待商榷，進而可能引發恐慌（在臺灣，如土壤和地下水受到重金屬污染以及環境荷爾蒙等）。生活環境中的毒物分布，正是人們現實中的社會危險處境。

貝克將其「風險社會」概念與馬克思和韋伯等人的理論對話，進而比較風險分配的邏輯與財富分配的邏輯之間的異同，突顯出今日因風險、認知和文化而非階級所聚集的人群。儘管貝克也坦承財富依然影響着風險的分配，使得最具風險的事物往往被散布在最貧窮的角落，然而在世界風險社會（下詳）的當下，風險的民主性、無邊界性和難以預測性，使得富人的逃生門不見得每一次都能在安全的地方打開。比方說，北京的霧霾使得中國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於2013年公開諷刺性地宣稱：「特權階級他們有特權的水，這次沒有特級的空氣了……」²¹

因為風險的不確定性，人們必須再進一步仰賴科學。然而，現代化風險會同時呈現特定地域性及非特定普遍性，而科學的預設並無法掌握不確定和暫時的災害路徑。也就是說，人們不能僅依賴科學具有普遍性的宣稱假說，而必須承認科學知識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生產。據論者所言，科學知識的生產乃具有社會脈絡性，特別是在當代全球化經濟競爭的驅動下，科學在某程度上是受到社會的需求與利益影響²²。事實上，科學一邊調查風險的內涵，一邊將其過程建立在假設上，而以機率作為可能性的行動框架。當科學條件被設置在極苛刻的情況下，其對安全的假定使得事實上的意外反而像是真正的意外，因其根本不在計算的公式之內。這也是科學應當與社會對話之處。套用康德（Immanuel Kant）對人類知性與感性的觀察，貝克主張：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形式的，社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盲目的²³。

對貝克而言，風險社會的風險是嶄新的：石器時代的人們沒有能耐產生核能與生態的自我滅絕，也沒有想到像氣候變遷這樣的人造風險帶來同樣的政治動能²⁴。風險自身及其公眾感知是彼此相互強化的，因為風險乃是透過

知識所認識的風險，所以風險感知和風險本身就是一體兩面²⁵。這種新的風險必須被同時視為階級性和民主性的：因為貧困者和被暴露於風險之下的人都無法像那些成功者（富人、有權勢者）一樣有效或全面地保護其自身；但它同時是民主的，因為無論處於甚麼地位或階級，風險都會影響所有人。貝克提醒我們：風險愈大，它就愈難逃離；這對任何人都是一樣的，無論他多富有或多有權勢²⁶。有些人決定、定義「風險」甚至是從風險中獲利，但那些被要求承擔風險、遭受他人決策的「未知副作用」甚至賠上性命者，卻沒有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²⁷。

風險的因果關聯性本身就是諸多個別條件彼此互相糾纏的複雜集合；試圖找出個別原因和責任，反而可能形成普遍「有組織地不負責任」（organised irresponsibility）的共犯結構²⁸。貝克在德國經驗中指出，在污染排放的問題上，政府的行動只是為風險進行粉飾而非預防。所以，這些因風險而誕生的科學、工業和政治，透過破壞既有的對科學、工業和政治之信任而得利。這裏更出現了理性間的競爭：不同的科學家與學科在政府所設立的專家論壇中爭奪論述權，獲勝者得以定調事實和獲取資源來進一步發展其學科。然而在今日衣食住行甚至空氣都出現問題時，與政府合作的自然科學雖然仍持續輕視大眾的恐慌、貶低人們對其基本生活權利的擔憂為理盲，但在長期被質問的過程中，也逐漸失去一部分權力到民主的決策過程中（例如開放公民專家或是利害關係人進入專家委員會中，甚至被他們加以取代）。風險分配的邏輯與方式在此變成改造民主社會的動能之一。

（二）當代社會基本體制下的個人化

《風險社會》一書第二部分處理的是當代社會基本體制下的個人化過程，而個人化過程也成為貝克對於福利國家體制和風險社會的深刻觀察軸線之一。作為一個關注工業社會以及社會制度與家庭的研究者，貝克觀察到當前的社會生活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轉變：福利國家與勞動市場、教育和就業關係，乃至於家庭和兩性分工以及個人的生命歷程，較傳統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時的現代化過程更進一步地瓦解。

貝克認為應該要有新的理論與範疇（category）和範式（paradigm）來支持我們的當代研究：也就是人被重新拋擲到制度化市場中的個人化過程。在論證這一點時，貝克再度與馬克思和韋伯對話。他認為二戰後德國所發展出的社會結構已經不能再以階級和階層視之，因為現代化風險的降臨不分階級²⁹。他認為不再是馬克思所指出的貧困化和勞動異化的共同經驗促成階級的形成，今天的人們在福利國家的勞動市場中日漸走向個人化。他也指出韋伯有關市場中介、社經地位的概念作為社會階層研究框架，已經無法用來分析1950年代以降德國的教育擴張和大量失業等情形³⁰。傳統的階級與階層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已經日趨個人化、但又不自主的社會。

貝克指出勞動市場需要的是具有特定品質和技能來完成特定工作的個人，而非一對夫妻或是一個家庭。與此相關的是勞動市場不斷提升的流動性

和對彈性的要求，使得理想中的勞動市場對象乃是單一而不受各種關係、婚姻或家庭所「拘束」的人³⁰。貝克與其妻子的研究也從另一方面論證：新的婚姻關係將會變成個人間的聯盟；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地讚揚新的婚姻關係：因為它代表了我們對富裕卻欠缺人性、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風險之拒絕；愛將會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而又難得³¹。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兩性分工、新家庭形態和職場生活一同變遷。我們所見到的，乃是福利國家驅動的勞動市場，它藉由不斷增加的流動性（地理和社會的）、教育和勞動市場的競爭要求，迫使相當程度的生活方式日漸個人化。個人被福利國家的制度所標準化並納入治理的單位中，但個人的命運卻被重新拋擲到市場競爭中。教育文憑貶值、低度就業、大量失業、新貧窮等現象彼此交織。每個人都在經歷風險和決策的過程，但這樣的共同經驗卻不再以階級和階層的形式出現。在個人化的情境中，成功是個人的成功，失敗也是個人的失敗；社會發展過程中導致的問題，都變成個人的問題。

不受拘束意味着將個人自工業社會的社群中釋放出來，迫使人們承擔發明並且活出自我生活的連帶性，儘管這種連帶性為何可能前所未聞。過去的中介機制如社會階級、小家庭、族群團體、兩性分工、福利國家雖然都還存在，但卻愈發脫離我們的掌握；個人必須在現代社會中直面日漸難以掌握的生命發展軌迹。

（三）科學實證取向的修正

《風險社會》一書的第三部分透過風險分配的問題和系統性的個人化問題，向內對風險的來源和定義者——科學——進行反思。貝克認為個人生存於當代由科學所支配的社會中，一方面被要求服膺於科學標準和社會安全的管制機制與計算中，另一方面也被暴露在相應的技術與科學的不確定性風險中。事實上，這些風險的不確定性與人們對它們的一無所知逾越了專家所能控制的範圍，外溢成為社會、倫理與政治的危機，甚至進一步造成技術、科學和工業可控制性的弱化，使得「堵塞」（congestion）變成當代文化的特性³²。現代化過程陷入堵塞，而追求「更大、更快、更好」的線性現代化使其自身陷入各種堵塞的危險中³³。

貝克挑戰科學實證邏輯的計算，質疑其是否能確切地表達出當代社會中的現實境況。這種質疑廣布在他對於統計平均值、管制標準的建立和風險閾值（意謂着何謂安全的邊界）的探討中。這實際上說明當代科學理性壟斷了對於事實的說明——也就是論述的權力，必須再次透過民主的過程使之得到解放。正如拉什和維尼在《風險社會》一書的序中提到，透過實驗室知識所打造的風險系統理想模型與實際的應用環境、設備和知識之間的巨大落差，需要透過反身性的學習過程（reflexive learning process）來與各種知識、次文化和認同進行協商磨合³⁴。但這個解放過程卻必須有更多的科學進入，並且迫使科學的反身性不斷地累積，最終達至一種不斷學習的狀態，而非全盤推翻科學。貝克認識到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貝克試圖建構的「反身性現代性」，是從無知與其非意圖性的後果來對知識的再肯認；工業社會建立的控制與安全體系已然失效，他從解構進步和現代論述的正當性來理解知識與當代問題^⑥。在沒有反思的情況下，以有限知識來確定不確定的事，以科學進步的神話來回應各種意料之外的災難，就是科學回應的必然軌迹。

當貝克討論以科學實證的方式如何無力探討社會風險時，他同時又尖銳地質疑既有的社會科學理論及其基本單位——民族國家和個人——實際上已經無法處理當前在全球尺度上所發生的問題。這並不意謂着我們要拋棄這些尺度，而是需要在思維上更大程度地包容，以避免現實在理論架構中失去意義。關於現實情況和研究工具與範式的探討，貝克分別採用「反身性現代化」理論和世界主義的觀點。最終，在「反身性現代化」的標題下，他提出如何超越啟蒙科學的信念，並拓展既有科學範式的視野。此外，他亦對治理的政治過程提出批判，並指出政治的去邊界化現象，以及質問科技與政治的兩難。

(四)「反身性現代化」與「第二現代」

根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貝克的說法，我們尚未超越現代性，只不過是見到現代的極端化而已^⑦。「反身性現代化」理論是貝克的理論基點。如前所述，他研究現代「後」的事物，但他並非「後現代」的支持者。相應地，他區分出「傳統」、「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第一現代往往指涉的是工業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稱為現代化，而從第一現代進入第二現代的過程即為「反身性現代化」。「反身性現代化」的關鍵論題如下：我們(專家、社會運動家、普通人、政治家、社會學家)怎樣應對我們的無知(或認識的無能)?我們怎樣在人為的不確定性中作出抉擇?

第一現代社會的預設有六個：(1) 民族國家的社會；(2) 依照程序而運行的集體個人化(如福利國家制度)；(3) 僱傭(全面就業)社會；(4) 自然外於社會而被視為資源；(5) 被科學所定義的理性和控制工具；(6) 社會功能不斷分化與不斷增加的複雜性^⑧。前三種預設屬於第一組，處理的是第一現代社會的結構和系統條件；後三者屬於第二組，是社會行動的自我描述，也就是人們在第一現代社會如何思索並理解其行為的形式。

貝克認為「反身性現代化」是一種無法控制的現代化，使人類社會逐漸朝第二現代邁進。它的發生既非現代化的目的，也無法提前預見。反身性現代化發生在實現工業現代化之後，它乃是現代性的再現代化。反身性現代性就發生在當現代性面對自身時，以及在面對與處理第一現代社會、單一線性現代化的副作用和無預期之後果中。這個緩緩地使我們進入第二現代的轉變過程始於1960年代並持續至今，貝克認為這個過渡是第一現代的成功所未預期的副作用。

雖然危機、變革和極端的社會變遷總是現代性的一部分，但反身性現代化不只改變了社會結構，更是徹底改變現代性自身的定位、範疇與概念。這意謂着反身性現代化最終結束於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勞動、全球秩序、社

會、自然、主體性、日常生活和國家^⑳。而這個過程是開放的——不盡然朝向好的方向，但也不盡然就會有壞的結局。

貝克在2005年關於如何設定第二現代作為新研究議程的研究中進一步闡述了「反身性現代化」理論。他認為在理論上和經驗上，所有西方社會都還是現代社會，並不存在明顯的現代性基本原則的斷裂，僅僅是現代性的基本體制在進行變革，例如民族國家與核心家庭。他認為當前所看到的這種情況就是第二現代性^㉑，且有五種特別的現象鬆動了第一現代性的地基，並將我們導向第二現代性：(1) 多重面向的全球化；(2) 基於福利國家和政治權利增強的更劇烈的個人化；(3) 全球環境危機成為政治議題；(4) 性別革命瓦解傳統的男女角色；(5) 第三次工業革命：彈性工作與各種低度就業的情形。這五種現象所帶來的是極端的現代化，並且侵蝕了現代性的根基，其過程往往並非其原來之目標，也無法預期；第一現代性最根本的可控制性、確定性或秩序的概念都在這個過程中崩壞^㉒。

2010年，貝克與慕尼黑大學政治系教授格蘭德(Edgar Grande)還繼續分別出四種主要的現代化路徑：第一種是西方的路徑，它既是在無預期之下誕生，也是時間上較為漫長且較為成功的現代社會之現代化案例；相對於此，第二種是東方的現代化，是主動且壓縮的，像南韓和中國這樣的發展型國家；第三種是比較被動的、強迫的、後殖民的現代化；最後則是失敗的現代化：第一現代的體制未曾建立，或者並未有效率地運行，或者在轉向第二現代的過程中失敗^㉓。但貝克在此階段的研究主要針對東亞與歐洲的經驗比較，並未列舉其他地區之案例。在進一步反思「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過程中，貝克將之與「世界風險社會」理論一樣加以提煉，這是下文將要探討的面向。

三 全球化、世界風險社會與世界主義

貝克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之再發明：全球社會秩序中的現代性》(*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和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危機》中，對個人化和風險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㉔。當今的新風險問題是在全球尺度的空間與時間中展開，並且由各式各樣的人群與事物彼此交織的。貝克很早就關注到「全球化」的意涵，也認為當代的風險社會乃是「世界風險社會」：風險是跨界(不受國界所拘束)且不分階級地降臨^㉕。貝克在不同的論著中對他所使用的觀念和方法做出一些關鍵性的界定。

對貝克而言，「全球化」意謂着地理邊界與經濟、資訊、生態、科技、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各面向的日常行為明顯地較不相關。它是一種雖令人感到熟悉但又難以理解的事物，以相當的力量正在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並且驅使所有人以各種形式來適應與回應。貨幣、科技、商品、資訊和毒物毫無阻礙地跨越邊界，即使是政府致力排除的事物、人和思想(例如毒物、違法移民或者違反人權的批判)，都會找到它們進入新領域的方法。可以說，全球化就像魔法般消弭距離^㉖。就經濟方面而言，投資者擁有翅膀，而國家則扎根於地上^㉗；全球金融流動作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已然不可逆。這種不可逆的性質，使貝克認

為我們應該以「全球性」(globality)的方式來理解全球化，也就是承認一定的全球化過程已經發生，這個過程直到如今已完全不可逆，並對我們理解社會由甚麼組成帶來深遠且根本的改變：「全球性意謂着我們已經在世界社會中生活很長的時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團體可以置其自身於他者之外。」^{④7}

然而，全球化與全球性作為現象與存在，貝克認為應該在方法論上突破以民族國家作為範疇來進行研究。民族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的意涵在於：民族國家等於某一社會、或等於某一地區、或等於某一民族、或等於……這種「或等式」使得今日的社會科學家無法坦承全球性現實的彼此連結、彼此交織，共同構成當代社會的複雜面貌。無論是後現代性、晚期現代性、全球時代，甚至是反身性現代化所強調的偶然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都被民族國家的研究尺度所迷惑了。因此貝克的研究愈往後期就愈加提倡範式轉移：從方法論的國家主義轉向世界主義，研究對象也從以國家作為單位改變為以風險(實際問題)作為單位；不是以行政區作為界線，而是以問題所及範圍作為界線。

貝克的研究顯示，必須從接受世界風險社會與世界主義的研究觀點來扭轉當前無力應對的態勢。在貝克使用的詞彙中，「第一現代」用來描述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現代性^{④8}，其中的各種社會關係和社群是透過地理空間的方式來理解的。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反身性現代化過程，使第一現代的基礎被摧毀，特別是全球風險(如氣候變遷和全球金融危機)已經使得這種地理空間的研究尺度難以解釋現實的情形。今日的學術或專業理論在政治上的最大挑戰就是每個社會必須同時對這些挑戰作出回應，而不能停留在單一社會的尺度上來進行思考。

然而所謂的專家與政治精英卻依然堅持以單一線性治理，以民族國家、科學工具來不停地加以預測，使得社會的反思過程呈現為「殘餘風險社會」：殘餘風險社會即為第一現代社會的具體實踐，透過不斷地用同一套邏輯去加以計算、預測和去除風險，卻忽略在未能預期風險的情況下如何承擔責任。實際上，當前風險計算的基礎，也就是科學，已經被各種爭議破壞其原本堅定的立場；而全球風險也日益引發國家—政府制度的崩潰，這從世界各地政府面對的信任度和合法性危機可見一斑。尤其，風險總是牽涉到責任問題，如全球市場是一種新的風險形式——有組織地不負責任，而個人無法也無需為此承擔任何責任。因此，這些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風險，就往往成為一個全世界的公共和政治問題。新的選擇握在我們手中：應當落入國家或地區的保護主義抑或接受跨國治理和民主化？

世界風險社會尊重這些多元中的共通性，而全球風險中的各種共通性使得世界各地的民眾面臨同樣的問題，甚至被激發出類似的情感。風險作為一種共通性，以決策為先決條件，以拓殖未來為企圖，並由認知和價值形成。當前世界劇烈的現代化過程使得大眾有了作為基礎的認識——風險並不等於毀壞……正是文化的認識與定義形成了風險。例如氣候變遷的各種情境，在聯合國大會中，人們所爭論的各種情境並非真實的事物，但倘若我們持續過往的生活方式並與專家規劃的路徑相符，那些情境儘管並非必然，也會變得有可能發生；在這種共通性上，我們所身處的便是世界風險社會^{④9}。

在面對今天跨界風險的研究中，貝克提倡世界主義的觀點。對社會學家而言，重大的任務就在於修正社會學理論而面對現實，為社會和政治的重構

提供框架。特別是在「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發展過程中，研究不僅是為了了解西方模型存在的問題，更是為了探究世界各地在不同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現代性之間有何聯繫。對貝克而言，非西方社會同樣也處於第二現代，而非西方就代表進步、非西方就仍落在傳統或是第一現代的發展過程中；反身性現代化及其後果本身就是多元的^⑳。

貝克對於「世界主義」的理解非常近似於希臘和羅馬的斯多葛學派(Stoicism)，他認為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乃是一個既作為整個宇宙(cosmos)的公民，同時也是一個城邦(polis)的公民^㉑。對貝克而言，世界主義的核心乃是承認「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相對於強調人類共同性的普世主義，貝克的世界主義期待人們在接受「他者」的相似性的同時，也接受他們的差異性。歐盟曾經是貝克心目中一個可能的世界主義國家，但在長時間的觀察後，他認為今日的歐盟乃是一個由精英主宰的去中心化、地理上分裂、跨國的協商系統而已^㉒。對他而言，今日的歐盟僅僅是接納對內的差異，而更加排斥對外的差異，這種情境體現在2015年敘利亞危機引發的難民潮對歐盟各國與《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有關開放邊界政策的挑戰^㉓。

從「世界風險社會」理論與世界主義的觀點延伸，貝克拓展了應對人類風險的尺度與參與者。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這能帶出一種「絕不重蹈覆轍」(never-again)的倫理。過去的人類災難並沒有被成功地預防，明日的人類災難卻可能也必須被預防：這就是「絕不重蹈覆轍」的倫理，根植於全球風險的邏輯之中^㉔。風險，只是帶來解放的契機；解決問題並非只是提出一個新的替代方案，而是重新挖掘既有基礎上的一切問題。

四 促成解放的災難

「風險」一詞從其誕生之初，就帶着計算與負面的意涵；然而貝克卻更進一步地看見從負面事物中所誕生的正面意義。這種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辯證邏輯式的倒轉思維，貫穿了他一生的研究。全面審視貝克的著述研究，可以發現他將「風險」的概念引介到學術界以至一般大眾的生活，主要目的並不是要讓人們從此活在恐慌之中；相反，正是為了讓人們更加認識一個正在轉變的時代，以及那些早就在變形(我們早就有所察覺，卻從未在制度上和社會上說破)的人、事、物。對貝克而言，認識風險是為了從既有結構中解放，然而未雨綢繆卻不是人的天性。另外，災難就像一個社會面臨死結，它不僅作為結構既有問題的最具體表現，也是不得被解決的問題；在處理災難的過程中迫使所有人一同認識並理解這個世界內在的結構性問題。

貝克認為在當前的全球風險逼近之際，人們沒有意識到在威脅潛伏之下已經產生新的公共財的可能。貝克認為這個新的公共財是存在於所有被全球氣候變遷等風險所影響或者關心風險的人之中。因此，單一民族國家不足以作為此一風險的研究尺度，也不足以解決此一問題；我們若是一再排除那些過去未能參與風險決策的人的意見，將無法處理這些新風險，甚至也無法保護自己；不過，一旦要為這樣的風險追究責任時，所有人又將因為這些決策

過程出現的缺陷而帶來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結果⁵⁵。對此，貝克認為解決方案乃是人們要從世界主義的觀點來彼此接納，並且以「風險社群」的方式來對待風險的決策者和受影響者。

在全球風險的面前，財富和風險的產生正在轉型，每個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消費習慣乃至於經濟、科學和政治模式都在發生變革。這些都是全球風險未能預期、也未預見到的副作用，但其中正向的副作用反而可能帶領人類邁向解放之路。對於全球災難的風險預期，使得一些人類最基本的文明價值受到挑戰，進而產生一種人類學式的衝擊，最終促成強烈的社會淨化。由此，貝克認為全球風險可以引發現代性的再生⁵⁶。

對此，他以2005年的卡崔娜颶風(Katrina，又譯卡特里娜)為例予以闡述。過去在美國紐奧良並不是沒有發生過洪水，也並非沒有種族問題；但在全球氣候風險的框架下理解這次災難，使得對環境不正義和不平等的質疑得以被納入討論，並連繫到美國的生態挑戰、種族主義歷史(制度性的種族主義)，迫使人們理解到自然災害的風險本質其實是社會且政治的。這個在論述上的範式轉移和透過痛苦來進行反思、進而引入新範式的過程，就是貝克所認為的社會淨化⁵⁷。而這個過程甚至也同樣發生在我們這些置身於事外，卻藉着各種媒體而感同身受的人身上，在此顯示出文化工作和意義工作(事物對個人的意義)也同等地重要。

氣候變遷的論述存在許多障礙有待克服，包含世代正義、殖民史、技術官僚、跨國家治理，甚至何謂綠色經濟、氣候變遷本身的共識等，而這是一個需要社會進行痛苦的反思而引發鉅變的過程。鉅變的過程就是如何將這些未來的風險重新問題化、重新進行評估與質疑，乃至於對我們自身日常生活的反思與批判⁵⁸。「鉅變」一詞在此與「社會變遷」有所不同：它是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重新設定，也是所有日常生活實踐的副作用——它的邏輯是「既……且……」(and)以及「都」(both)。每個人都身處並在創造蛻變之中，但每個人受到的影響不見得完全相同⁵⁹。

雖然每個人所受到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但是這些全球風險強化了世代的範疇轉變。貝克借助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歷史社會學或「動態社會學」(dynamic sociology)的研究，以探討階級和世代的範疇轉變。關於世代，乃是在其時間中的歷史位置，同樣命運的世代關連、對問題的共同理解將其連接為世代，並且成為社會的行動者。貝克認為在世界主義化的過程中，全球風險構成並轉變了有關問題的常識、歷史和理性；而各種矛盾無法再度被外部化而彼此碰撞，最終變成世代的意義標準(horizon of meaning)⁶⁰。原來活在個人化、片段化的世代中之個人，因全球風險的反身性而連結在一起。這股動能不是革命，但發揮的力量卻遠比革命更大。

總的來說，貝克強調災難所蘊生的解放，藉着像是卡崔娜颶風這樣的案例使得全球正義的規範性水平得以被全球化地理解和界定，而作為未來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羅盤。

貝克的「風險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理論和對災難的看法，彷彿述說着一個社會從認知風險、強迫自身面對自我製造出來的風險，最終藉着災難的風險而開拓出解放和改變的可能。對東亞社會而言，近十多年來無論在台灣、

日本、南韓、香港或中國，人們不斷地承受各種跨界的風險或災難，舉凡食品污染或風險(美國狂牛症牛肉、瘦肉精牛肉、三聚氰胺奶粉、戴奧辛污染肉品、塑化劑污染食品、基因改造食物等)、福島核災輻射污染擴散、PM2.5懸浮微粒污染擴散、劇烈氣候變遷引發大規模的土石流或洪水、各類型的災難(地震、輪船翻覆)，甚至快速的老人化、少子化等，已經形成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風險挑戰。

這些跨界的風險與災難為區域內各國社會人們生存帶來震撼，也從貝克倡議氣候變遷災難所形塑的新的世界主義政治(cosmopolitan politics)延伸出去^⑥，具有高度的災難解放政治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災難與風險一次又一次地於不同國家間形塑新的跨界風險社群，可能打破傳統上國族政治間的敵友對立關係^⑦，而創造出新的跨界以及世界主義風險政治。或許，在東亞地區，跨界的風險在未來將打破長期以來日本與韓國、台灣與中國的敵對立場，而促使人們共同合作與努力，來解決各種災難風險的威脅。

五 結論：邁向亞洲

全球性災難及其風險創造出世界主義的風險政治，開啟了全球跨界風險治理的可能性；並且最有可能落實在區域合作的現實議題中。世界風險社會同時展現出現實間的彼此牽連性與複雜性。即使是在全球化的當下，有些區域在文化、價值、認同、經濟發展方面連動性的確比較高，也比較有可能就實際面臨的災難風險而促成超越當下格局的區域政治。例如福島核災不僅改變了日本的能源與國土安全治理措施，也影響到南韓、台灣、中國對於進出口食品安全的檢驗、海洋監測、輻射在大氣中的擴散、核電廠是否續建或營運等議題；同時引發正面與負面的風險社群意識。與此同時，福島核災也使得日本與台灣、南韓在學術和政治實踐上跨出合作的步伐，並且形成如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所締結的城市發展經驗分享。從正面的角度看，各地政府願意投入參與區域合作並非通過國家正式協商，而是因應個別共同關心的議題而形成了風險聯盟，並進而於更在地(城市)的層級上達成具體實踐的可能。然而，從負面的角度看，傳統的國家、邊界與群體的界線卻未完全消失，並繼續主導人們認識意義的方式。

貝克自《風險社會》一書以降，一直在探索新的範疇與範式和理論來支持當代社會研究。他的晚期研究開始和東亞的發展經驗展開對話，強調「第二現代」的意義並非指世界各國繼續單一線性的追求、模仿工業先進國家的現代化；而是指每個國家應反身性地檢視該社會獨特的政治、歷史、經濟與文化特性，從而尋求新生的、具有自我內涵的現代化發展。也就是說，「第二現代」是複數、多元的現代。另一方面，南韓和台灣的學者則在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中找到可以與自己國家的發展經驗互相印證的論點，例如以「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來形容追趕型社會所面臨的急遽擠壓所帶來的後

果^③；又或者批判在地社會發展出試圖快速模仿西方、急功近利而可能徒具形式的特殊「現代化」經驗^④。然而，東亞的研究者反過來修正與改造「世界風險社會」的論點，也轉移了貝克後期研究的方向。

貝克自2014年於南韓首爾會議中提出、並原定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的蛻變》中的「蛻變」理論，比「世界風險社會」理論還要再進一步：它並非關於良善的負面副作用，而是關於負面事物的正向副作用——它們產生關於共善的規範性水平，並且驅策我們以超越國族的框架開啟世界主義的世界觀。貝克晚期作品中，對於全球性風險的正向副作用充滿開放性的期待。他認為災難可以解放我們在世界存在、對世界的思考方式，以及對政治的想像和實踐，儘管這個過程也可能導致我們墮入永無止盡的尋求技術解方的魔咒中^⑤。但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個鉅變下的蛻變卻毋庸置疑——蛻變是完全開放的，甚至逆轉也是可能的；世界主義的發展過程也有可能再強化帝國主義的權力結構。然而貝克的突然離世，使得他有關世界將會如何蛻變的理論工作只能留待人們繼續發展。

通過貝克理論的啟發，我們需要以世界主義的方法來審視與創造在地社會特殊脈絡的現代化與現代社會。雖然貝克主張進行世界主義的研究與實踐要回到「鑲嵌於國家」的政治社會問題，尋求對該國的政治改造^⑥，但我們主張應當更進一步，重新以東亞或亞洲為出發點，注重本土社會與鄰近國家的相近特質，以「鑲嵌於區域」為視角^⑦，來考察區域內各國相似的問題結構，並尋求共同改造區域內的政治社會，為東亞、亞洲在新一波的全球鉅變中創造出新的、多元的、具有東方永續意義的現代國家與社會。

註釋

① 摘自貝克原定於2015年出版新書《世界的蛻變》(*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 How Climate Change is Transforming Our Concept of the World*)，但隨着他的逝世，該書將延後出版(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簡介參見www.amazon.com/Metamorphosis-World-Climate-Transforming-Concept/dp/0745690211/ref=sr_1_10?ie=UTF8&qid=1453083643&sr=8-10&keywords=ulrich+Beck。

②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n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③ Ulrich Beck and Natan Sznaider, "Unpacking Cosmopolita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Research Agend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7, issue 1 (2006): 1-23.

④ 決議的摘譯，參見德國安全能源供應倫理委員會：〈德國能源轉型：一個集體為未來的努力〉(2015年12月3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網，<http://rsprc.ntu.edu.tw/zh-TW/energy-transformation/316-germanys-energy-turnaround>。

⑤ Bruno Latour, "Ulrich Beck (1944-201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 January 2015.

⑥⑦ 參見Fuyuki Kurasawa, "Ulrich Beck's Divergent Influences in North America", *Global Dialogue* 5, no. 2 (2015), 32-33。

⑧ Ana María Vara, "Ulrich Beck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Dialogue* 5, no. 2 (2015): 28-29.

- ⑨ 顧忠華、鄭文輝：〈「風險社會」之研究及其對公共政策之意涵〉，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台北，1993）。
- ⑩ 顧忠華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 ⑪ 周桂田：〈「風險社會」中結構與行動的轉軸〉，《台大社會學刊》，第26期（1998年6月），頁97-150；〈現代性與風險社會〉，《台灣社會學刊》，第21期（1998年10月），頁89-129；〈生物科技產業與社會風險：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2000年9月），頁239-83；〈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台灣社會學刊》，第31期（2003年12月），頁153-88。
- ⑫ 周桂田：〈知識、科學與不確定性——專家與科技系統的「無知」如何建構風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3期（2005年6月），頁131-80；〈新興風險治理典範之芻議〉，《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2期（2007年9月），頁179-233。
- ⑬ 貝克（Ulrich Beck）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貝克、貝克—葛恩胥茵（Elisabeth Beck-Gernsheim）著，蘇峰山、魏書娥、陳雅馨譯：《愛情的正常性混亂》（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貝克著，汪浩譯：《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 ⑭ 貝克（Ulrich Beck）著，何傳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貝克著，吳英姿、孫淑敏譯：《世界風險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貝克著，楊祖群譯：《世界主義的觀點：戰爭即和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貝克、格蘭德（Edgar Grande）著，章國鋒譯：《世界主義的歐洲：第二次現代性的社會與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⑮ 事實上，2006年《英國社會學期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曾刊出以貝克為主導的「世界主義社會學」（Cosmopolitan Sociology）特刊，統整世界主義的理論與各國相關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經驗研究。而2010年在貝克協助之下，《英國社會學期刊》再次發行特刊，不過這次乃以東亞社會反身性現代化議題為焦點。只可惜該期主要東亞主事者甚為偏狹，大多內容集中為南韓學者的研究，僅點綴性地放置一位中國、日本學者的論文，代表性相當不足。而學術操弄的現象也延續到2015年初《當代社會學》（*Current Sociology*）環繞貝克世界主義治理議題的專題。貝克雖倡議理念，但對於學術界的此種違反世界主義的操弄並不甚知。
- ⑯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1992).
-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9-16; 12; 10; 10; 30; 49; 55; 6; 96-97; 116.
- ㉚ 〈馬雲：北京霧霾 特權階級沒特供空氣了〉（2013年4月2日），《中國評論》月刊網絡版，www.zhgp.com/crm-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9&docid=102489351&page=1。
- ㉛ Helga Nowotny, Peter Scott, and Michael Gibbons, "The Co-evolution of Society and Science", in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30-49.
- ㉜㉝㉞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issue 3 (2010): 409-43; 416; 409-43.
- ㉟ Ulrich Beck, "Beyond Class and Nation: Reframi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issue 4 (2007): 692.
- ㊱㊲㊳㊴㊵㊶ Ulrich Beck, "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 What Does It Mea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63, no. 1 (2015): 76; 76; 79; 80; 83; 77-78; 85; 75-88.
- ㊷ 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trans. Mark Ritter and Jane Wiebel (Malden, MA: Polity Press, 1995), 2.
- ㊸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trans.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117.

- ③④④⑨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72-91; 19; 109-31.
- ③⑤ Scott Lash and Brian Wynne, introduction to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3-8.
- ③⑥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trans. Mark Rit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③⑦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ed.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 ③⑧③⑨ Ulrich Beck, Wolfgang Bonß, and Christoph Lau, "The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roblematic,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 no. 2 (2003): 4-6; 2-3.
- ④⑩④① Ulrich Beck and Christoph Lau,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issue 4 (2005): 525-26; 526.
- ④⑤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④⑥ 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20.
- ④⑥⑤① Ulrich Beck, *Power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72; 35.
- ④⑦ Ulrich Beck,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10.
- ④⑧ 貝克：《世界風險社會》，頁 175。
- ④⑨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Cosmopolitan Europe*, trans.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53.
- ④⑩ 參見鍾詠翔：〈難民潮衝擊 歐洲「申根區」瀕瓦解〉，《經濟日報》，2015年9月15日，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8539/1187337-%E9%9B%A3%E6%B0%91%E6%BD%AE%E8%A1%9D%E6%93%8A-%E6%AD%90%E6%B4%B2%E3%80%8C%E7%94%B3%E6%A0%B9%E5%8D%80%E3%80%8D%E7%80%95%E7%93%A6%E8%A7%A3>。
- ④⑪ Ulrich Beck and Natan Sznaider, "Self-limitation of Modernity? The Theory of Reflexive Taboos", *Theory and Society* 40, no. 4 (2011): 417-36.
- ④⑫ Ulrich Beck, "How Climate Change Might Save the World",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43, no. 2 (2014): 169-83.
- ④⑬ Kyung-Sup Chang,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issue 3 (2010): 444-64.
- ④⑭ 周桂田：〈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頁 153-88。
- ④⑮ Shinichiro Asayama, "Catastrophism toward 'Opening Up' or 'Closing Down'? Going beyond the Apocalyptic Future and Geoengineering", *Current Sociology* 63, no. 1 (2015): 89-93.
- ④⑯ Ulrich Beck, "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 Public lecture in the Seoul Conference 2014 with Professor Ulrich Beck (Seoul, 2014);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Cosmopolitan Europe*, 224-64.
- ④⑰ Chou Kuei Tien, "Cosmopolitan Approach of Trans-boundary Risk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World Congress of Risk Analysis (Singapore, 2015).

周桂田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徐健銘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